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7.2

一年出版4期，以17種語言刊出

杜特蒂對自由民主的反叛

Walden Bello

巴基斯坦社會學

Ayaz Qureshi,
Nida Kirmani,
Kaveri Qureshi,
Tania Saeed,
Amen Jaffer

紀念

Zygmunt Bauman

Peter McMyllor,
Maciej Gdula,
Peter Beilharz

加拿大社會學

Howard Ramos,
Rima Wilkes,
Neil McLaughlin,
Daniel Béland,
Patricia Landolt,
Cheryl Teelucksingh,
Karen Foster,
Fuyuki Kurasawa

特輯

- > 美國大學：新的移民議題鬥爭場域？
- > 介紹阿根廷編輯團隊

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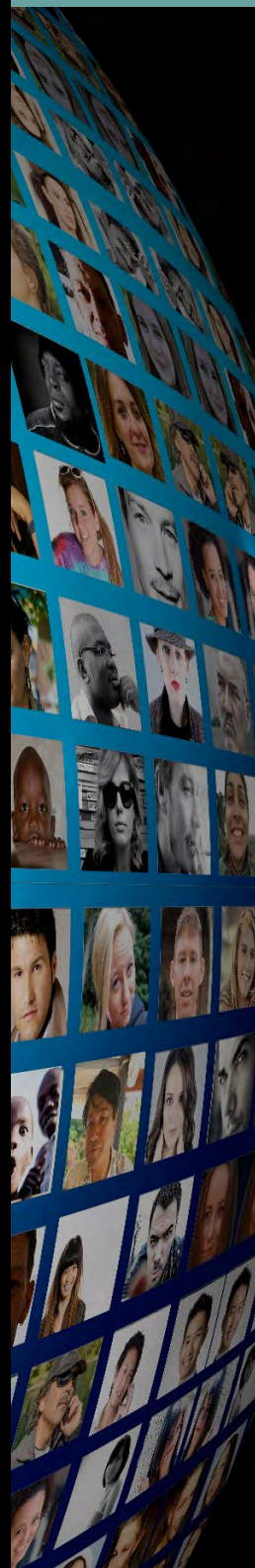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7卷 / 第2期 / 2017.6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編的話

反動年代的社會學

杜特蒂、埃爾多安、奧班、普丁、勒龐、莫迪、祖瑪、川普，這些人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民族主義者、排外主義、威權主義。而川普的勝選也為非自由的運動和右翼獨裁增添的能量。毫無疑問的，政治的反動浪潮已經醞釀了幾十年了，而自由民主體制推進了第三波的市場化，助長了危險、排外、不平等的現狀。1920 和 1930 年代的法西斯主義是現在反動的前身，起因於第二波市場化潮流。二戰瓦解了這波市場化，但我們可以確定現在這波會被瓦解嗎？自由民主的體制有多強韌？川普政府的前期我們看到了對於其行政命令的反抗。Portocarrero 和 Lara García 指出了這種反抗如何在大學校園中產生。那其他國家呢？這期 Walden Bello 描述了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的殘忍統治，其興起是可以歸因給自由民主體制的失敗的，因為推翻了代表美國外交政策支持的政治腐敗、不平等社會的馬可仕政府，杜特蒂就是誕生在這脈絡中的。這個對於自由民主的缺點的政治回應可能透過民粹而出現，即使其是抗議宰制階級的利益，但是卻是妖魔化那些污名化的人口，像是吸毒者或是販毒者。這就像埃爾多安妖魔化庫德族人，川普妖魔化移民，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妖魔化非亞利安人種。的確，Bello 對於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對比太令人信服了。

巴基斯坦是個軍事統治國家，其民粹的訴求伴隨著經濟力量的集中。巴基斯坦的社會學受到諸多限制，但是很有創意和批判性：我們看到這期的文章描述基礎建設的發展如何讓跨國企業受惠，波灣國家如何監控移工的身體，以及女性即使進入勞動力市場也沒辦法脫離家暴的困境。另外還有研究在英國的巴基斯坦移民婚姻關係和穆斯林學生如何受到安全政策的影響。這五篇文章顯示了後殖民社會學如何超越了國家的邊界。

很不同的是來自加拿大的樂觀主義社會學，討論關於移民和環境正義的議題。加拿大的社會學更緊密地和政策結合。儘管前總理 Stephen Harper 的鄙視，社會學在加拿大受到社會廣泛的接受，他們失望的語氣反映的是其對社會民主體制的高度期待。

若有任何的社會學家看到了這個時代問題的癥結，那非 Zygmunt Bauman 莫數了。他於 91 歲過世。我們刊登了 3 篇的紀念文章，寄載了其傳奇的一生，有著宏大的道德視野，並且抱持著懷疑的烏托邦夢想。Bauman 的社會學將會影響我們數十年之久。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Walden Bello 是學者、政治運動者、全球社會學家，描述菲律賓的杜特蒂政權。



巴基斯坦：來自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的學者的跨國社會學研究。



Zygmunt Bauman：紀念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學家。



加拿大：驕傲且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學。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贊助。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副主編: Gay Seidman.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Mina Azizi, Mitra Daneshvar,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iki Aoki, Masataka Eguchi, Mami Endo, Akane Higuchi, Yuka Hirano, Hikaru Honda, Yumi Ikeda, Izumi Ishida, Aina Kubota, Yuna Nagaye.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Adrianna Drozdowska, Łukasz Dulniak, Jan Frydrych,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Łukasz Żołądek.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Costinel Anuţa, Maria-Loredana Arsene, Tatiana Cojocari, Andrei Dobre,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Rodica Liseanu, Mădălina Manea, Mihai-Bogdan Marian,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ş-Mihai Muş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Ion Daniel Popa, Diana Pruteanu Szasz, Eliza Soare, Adriana Sohodoleanu.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反動年代的社會學	2
杜特蒂對自由民主的反叛 Walden Bello, 菲律賓	4
> 巴基斯坦社會學 波灣國家的醫療監控 Ayaz Qureshi, 巴基斯坦	7
經濟參與和對女性的暴力 Nida Kirmani, 巴基斯坦	9
移民中的離婚 Kaveri Qureshi, 巴基斯坦	11
恐伊斯蘭症與英國的反恐安全政策 Tania Saeed, 巴基斯坦	13
基礎建設的政治 Amen Jaffer, 巴基斯坦	15
> 紀念 Zygmunt Bauman的道德視野 Peter McMylor, 英國	17
Zygmunt Bauman：懷疑的烏托邦 Maciej Gdula, 波蘭	19
紀念Zygmunt Bauman Peter Beilharz, 澳洲	21
> 加拿大社會學 非社會學時代的社會學 Howard Ramos, Rima Wilkes, Neil McLaughlin, 加拿大	23
貢獻社會學於公共政策 Daniel Béland, 加拿大	25
加拿大危險的非公民身份 Patricia Landolt, 加拿大	27
貢獻社會學於環境正義 Cheryl Teelucksingh, 加拿大	29
在就像(從未很像)任何其他時代中的社會學 Karen Foster, 加拿大	31
動盪年代與媒體交手 Fuyuki Kurasawa, 加拿大	33
> 特輯 美國大學：新的移民議題鬥爭場域？ Sandra Portocarrero, Francisco Lara García, 美國	35
介紹阿根廷編輯團隊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阿根廷	37

> 杜特蒂對自由民主的反叛

Walden Bello, SUNY Binghamton大學，菲律賓國會前議員



納粹的反革命勝利後，Joseph Goebbels 說了有名的話：「1789 年是被歷史所抹滅的。」按照這說法，我們可以說美國、歐洲、其他地方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可說是把 1989 年從歷史上擦掉嗎？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發生。法蘭西斯福山和其它人在 1989 年說自由民主帶來了歷史的終結。歐洲和右翼的威權與共產主義的瓦解是政治自由主義的勝利，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義將代表人類的理想政體。

福山的烏托邦很快的被反自由主義運動所挑戰。主要是那些中東的政治伊斯蘭主義和中東的排外主義者。但是沒有運動或是個體可像杜特蒂對於自由民主那麼魯莽的拒絕。杜特蒂是 2016 年 5 月剛選上的總統。

> 剷除主義

杜特蒂的招牌政績就是反毒戰爭。9 個月來就處死了 8000 多人。這不是一個法治的政策。這是一個透過偽裝成科學的納粹種族主義理論的法西斯主義政策。這個政策把人民的生命權剝奪了，沒有法治可言。杜特蒂認為吸毒者不需要被當成人來看待——這些人超過 3 百

老牌的復仇者Rodrigo Duterte, 稱為DU30 (發音為「du-terte」)或是「處罰者」，Arbu繪。

萬，總人口有一億三百萬人。他典型的說法是：「這是違反人性的犯罪？等一下，我想問：他們算是人嗎？你們對人的定義是什麼啊？」

把行刑殺戮證成是警察自我防衛，杜特蒂說吸食shabu——一個當地對安非他命的稱呼——會造成腦萎縮，且不可完恢復。把吸毒者稱為「行屍走肉」，「對社會沒用」，杜特蒂稱這些人恐慌且危險。杜特蒂授權警察無條件射殺吸毒者，的確，對於那些非法射殺吸毒者的警察，杜特蒂給予特赦，然後「可以去追殺那些檢舉你的人」。

儘管因為這些觀點和選舉承諾像是用那些毒販的屍體去餵胖馬尼拉灣的魚，杜特蒂仍然是很受歡迎的。其支持率有83%，並且網民相當愛戴，並且發動網路肉搜去攻擊那些批評杜特蒂的衛道人士。

> 杜特蒂主義的源頭

杜特蒂的群眾基礎從哪裡來的？是的，其對吸毒者和毒販所造成對社會的傷害受到了廣泛的迴響。但是還有其它因素。杜特蒂掌握了民眾在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後所帶來的自由民主主義政體的幻滅。事實上，所謂的「人民力量革命共和」——有一條道路以此為名紀念當時推翻馬可仕政府的革命——的失敗造成的杜特蒂的成功。

杜特蒂的路徑是透過精英對於選舉系統的掌控、財富的集中、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華盛頓對於外債常還得堅持。2016選舉時，在人

民力量革命共和的承諾、財富重分配的願景和現實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大量的貧窮，不平等，貪腐層出不窮。艾葵諾三世總統的無能也不意外讓超過1千6百萬的選民，40%的投票人投給了這個在南方城市Davao在位超過30年的人。如小說家Anthony Doerr對於戰前德國人的描述，菲律賓民眾「渴望一個對的人」。

此外，人民力量革命的論述：民主、人權、法制，對於許多菲律賓人來說已經太令人窒息了。杜特蒂的論述：赤裸裸的死亡威脅，直接的髒話，咒罵，並結合幽默稱一個精英是coños或是臭機掰，這些證明了他號招大眾的方式，其支持者對可以從令人窒息的精英偽善中獲得解放。

> 法西斯的根源

杜特蒂的私刑政策，其跨階級的動員能力，以及其政治權力，已經讓菲律賓的美式權力分立體制瓦解了。這讓他成為了法西斯主義者，但是是一種特殊的法西斯主義。若傳統的法西斯主義是透過侵害公民自由而掌權然後迫害，杜特蒂剛好顛倒，是先迫害，然後減少對公民自由的侵害，然後獨攬大權，這是閃電戰法西斯主義。

其他杜特蒂的政治手段特徵是他邀請傳統左翼政治人物入閣，這樣的結盟對於以前的法西斯主義來說是不可能想像的。他不把左翼當作政敵，反而認為可以控制他們。同時，共產黨和國家民主陣線也很高興可以入閣，以挽救日漸下滑的政治影響力。

杜特蒂雖然是外交政策的新手，但是顯示了對於菲律賓民族主義的熟稔與掌握。他在美國歐巴馬總統批評他的掃毒政策後稱其是「狗娘養的」，而其對中國的開放態度似乎在政治上是險棋，因為親美主義是菲律賓的傳統，可是令人驚訝的是他的舉動鮮少受到反對，反而在網路上受到許多支持。就像許多人看到的，一般的菲律賓民眾或許對美國制度景仰，但是對於美國的殖民歷史卻是有著很深的反感，包括了不平等的條約和美式文化的入侵。這裡我們不用使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就可以了解菲律賓和美國之間的這種「爭取肯任」的文化。杜特蒂已經抓到了菲律賓人民的這種心理，而左翼還抓不到。就像許多威權領導人一樣，杜特蒂能夠有效地結合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

> 修辭的民粹，實質的法西斯

雖然他的修辭相當民粹主義，但是杜特蒂毫不保留的說會利用大眾去執行重分配政策。然而，像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者，他試圖要平衡階級力量並同時投射出一種超越階級衝突的景象。選舉期間，杜特蒂承諾要去中止臨時契約勞動，管制礦業，然後幫助那些在馬可仕政權下被不公平課稅的椰子農民。但是那些承諾在政治精英成為他的盟友的時候都沒有兌現。但是長期來說雖然那些經濟改革對於其政治影響力是重要的基礎，可是短期間沒有改革卻也不影響他的受歡迎程度。

目前政治上反對杜特蒂的力量還是很弱的。同樣

>>

的，基督教勢力向來是人權的支持者，也沒有針對杜特蒂批判。教會因為自身的貪腐和固執的家庭計劃立場，所以無能為力。反對勢力只來自於少數的個人，像是參議員 Lila de Lima，現在因為被控告接受毒梟的賄絡而入獄服刑。或是來自少部份媒體，以及人權團體像是 I-Defend。

> 杜特蒂、菲律賓社會、社會學

杜特蒂或許在政治上是該譴責的，但是他的人格特質與矛盾讓許多社會學家注意到了。有些人問關於社會歷史潮流怎麼和個人連結在一起。最近的紐約時報描述杜特蒂是一個在他高中的時候被耶穌會教士性侵而受影響的人，這是杜特蒂在 2016 年的選舉中自己說的。該教士後來到了 Los Angeles，又繼續性侵其他小朋友，沒有人把他移送法辦，而他最在耶穌會的介入下用 1 千 6 百萬美元和受害者和解。若是這樣的心理創傷塑造了今日的杜特蒂，那整個菲律賓社會豈不是在一個性侵犯的犯罪下受到二度傷害？

以哲學家 John Gray 的話來說，社會學家或許也會問：我們所看到的文明生活如何在轉瞬間消失殆盡？特別是在 1986 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之後，菲律賓就便成了自由民主的招牌。許多人認為推翻了馬可仕政府，菲律賓重新肯認了美國殖民時期所內化的價值，也就是個人權利，法制，民主。人民力量革命後的自由民主體制似乎體現了這些價值。但是忽然之間，就在短短一年以內，許多菲律賓人支持了一個主張非法私刑的總統，許

多人願意為杜特蒂去執行私刑，借用 Daniel Goldhagen 對於納粹德國的描述，就是「自願的幫凶」。對某些人而言，看到許多歡呼杜特蒂私刑的支持者是無法解釋且悲劇的。而對那些參與其中的其他人而言，菲律賓人似乎不是文明的，不是具有同情心的。或許我們必須用 Goldhagen 所提出去看納粹德國同樣的角度來看菲律賓吧：

這個時期可以用人類學家的批判眼光來看，從一個未知的海岸出發，對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可能性保持開放，而為了要解釋這個文化的組成、這個文化實踐、集體行動與生產的特殊性，這個人類學家要想出一個和自己的常識所不同的、甚至相互違背的解釋邏輯出來。這樣的解釋會承認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多數人，即使是出自於善意，是可能、且願意去殺人的。

> 比較大屠殺

同時，屍體數量持續增加。杜特蒂的反毒戰爭已經造成成比東南亞近代史的種族屠殺人數更多的死亡人數了。波布的 1970 年代的赤柬大屠殺有 3 百萬人死亡，印尼的 1965 年的蘇哈托政權則屠殺了近百萬人。最近杜特蒂才對媒體誇口說大概還要殺個 2 到 3 萬人才可以把毒品全部清掉。許多觀察家則認為即使杜特蒂在開玩笑的時候也要認真對待其言論，所以他說的 2 到 3 萬還是低估的數字。■

來信寄給 Walden Bello
<waldenbello@yahoo.com>

> 阿拉伯波斯灣 移工的醫療監控

Ayaz Qureshi,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在Peshawar等待要移民的人排隊接受醫療檢驗。Ayaz Qureshi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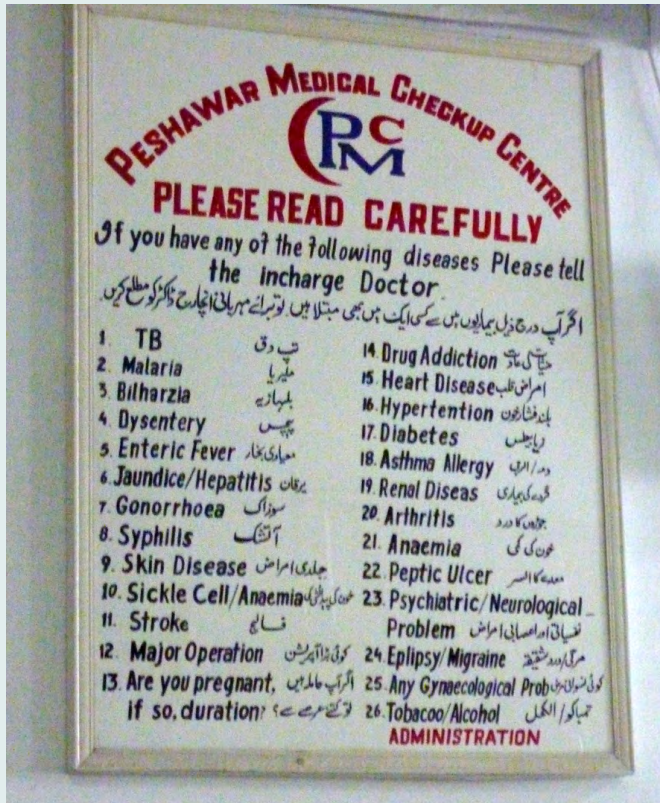
在過去 30 年來，越來越多的發展國家把它們的人民送出國外工作，巴基斯坦人民許多在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GCC) 的國家中工作——巴林、科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但是要獲得這些 GCC 國家的簽證，移工要在出發前就有健康證明，而且必須只能從 GCC 認可的醫療機構發出。移工因此要去幾個大城市通過這些醫療檢驗。只有那些過去或現在沒有任何疾病的人才可以得到健康證明。

GCC 國家對於這種選擇健康的移工的方式沒有任何的遲疑。巴基斯坦為了和其他鄰近國

家競爭——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等國家競爭，是不敢有疑問的。雖然巴基斯坦的政府因為那些移工匯款回國的金額而會獎勵那些移工，並且描述移工為非正式的外交人員，肩負著穆斯林的道德責任和巴基斯坦的認同，但是那些移工在波灣國家並沒有真正受到外交部門的支持，而且波灣國家也對於增加簽證感到焦慮。

不規則和有問題的實做的案例層出不窮。許多案例顯示了剝削的存在，而也對於監控結果的氣餒來自於其他醫療機構的反證，並且國家的退位，讓位給私人醫療中心去決定誰「健

>>



在Peshawar給移民做醫療檢驗的中心。Ayaz Qureshi攝影。

康」或是「不健康」。

中心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網絡，地區和中心的波灣認證的醫療中心協會負責看管這些相關的利益，透過獨占市場，並且透過平均分配而切斷競爭，也保障中心工作的員工不會受到遣返，也不會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管制。監控標準則是由 GCC 國家在沙烏地阿拉伯的秘書長設置，而相關的實驗是設備、空間、人員等都是透過 GCC 秘書長去控管。

不像其他的醫療監控例子，像是美國的 Ellis Island 或是 Angel Island 的例子，巴基斯坦移工的醫療監控是往往更不可見，而且更有侵入性。

害怕無法通過醫療監控過程，有些移工落入了蛇頭的控制。有些無法得到證明的移工則往往落入了非法的偷渡管道。

即使得到了健康證明，有些時候必須經過許多回合的檢測和花很多錢，這些都是醫療監控，且是移工進入波灣國家的必要程序。任何的工人若是無法完成這些程序就會被遣返。若是被允許進入那些國家，那就要透過這些醫療監控去更新簽證。

諷刺的是，流行病學的證據顯示移民通常是在移入國家才感染肺結核或是愛滋病的，因為政策規定沒有任何染病是更新簽證的前提，而檢查都是在 GCC 國家中進行的。例如，以愛滋病為例，通常這是因為移工都在勞動營中居

住，有性需求則只好找上性工作者。

任何人若是被檢驗出愛滋病就會被居留或是遣返，並且也不會告知個人或是政府。有些工人是備用「不預期放假」的方式被解僱，因為放假後就沒有再召回了。有些被遣返者甚至沒機會去收拾行李，和室友解決紛爭或處理事務，也沒機會收拾護照等就被遣返了。許多人回到巴基斯坦只有帶著一頁的緊急護照作為身份證明。有些則要等移民官員去確認巴基斯坦身份，過程可以長達數週，只有等到家人找到當地的代辦幫忙才可能走完程序。

世界上有越來越多對於「健康公民權利」的抗爭興起，人們也要求政府提供健保和挑戰那些限制人民權利的醫療。巴基斯坦的移工則還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有集體行動的可能，而政府則繼續和 GCC 國家合作，繼續透過監控健康去剝削移工。■

來信寄給 Ayaz Qureshi

<ayaz.qureshi@lums.edu.pk>

> 經濟參與和對女性的暴力

Nida Kirmani,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Karachi的女性的經濟活動。Nida Kirmani 攝影。

發展部門和國際金融機構認為增加婦女的勞動參與會增加經濟成長和賦權女性，這是一個雙贏的情況。此外，人們通常預設在經濟上主動的女性比較不會受到性別歧視的暴力。

透過在巴基斯坦 Lyari 的田野研究——那是 Karachi 最歷史悠久的工人階級地帶——我的研究檢測了那些簡化的假設。巴基斯坦的女性只有 22% 的女性從事有給勞動，這是世界上最低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我

的田野場域 Lyari 正好符合巴基斯坦的全國統計平均值，不過，雖然巴基斯坦的多數勞動女性是農業，Lyari 女性則是在都市從事低薪的家務工作，或是在公立及私立學校擔任教師。雖然有給勞動參與率很低，但是相較前一個世代是有成長的，只是當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能提供給女性的工作都是低薪、不安全、沒保障的。

可是，「經濟的能動」並不一定等於「賦權」。如 Naila Kabeer 所說的，市場力量通常

透過不平等的工資和僱用再生產了性別不平等，相似地，當政策制定者常常假設經濟參與給予女性可以控制自己收入的權力、財務自主可以讓她們遠離家暴環境的時候，現實是遠比這種假設複雜的。女性的經濟參與還是依賴於其工作的本質、家庭的權力關係、以及社群的動態而定。

女性有收入之後可以保障她們遠離性別的暴力嗎？根據統計，在 39% 和 90% 之間的已婚女性遭受過性別暴力。

>>

那我們不禁想要問：勞動女性更可以抵抗雇主的剝削嗎？有工作的女性會得到更多的對於家庭資源與自身收入的控制權嗎？

我和 Lyari 女性的訪談結果顯示了女性勞動參與和家庭暴力之間複雜的關係。對一些女性而言，經濟自主可以讓她們離開或至少讓她們會去設想離開其暴力的婚姻，但是領取時薪的女性來說，社會壓力仍然存在，特別是考量到小孩的情況下，這還是讓女性打消了離婚的念頭。

許多女性描述了工作和家庭之間的雙重負擔，這就是一種暴力。有給勞動有時增加了家庭內的緊張，因為失業的男性都會希望老婆要負起家庭照顧的全責，並且會導致爭吵和暴力相向。許多低薪的女性會選擇在家，而有些則會埋怨其丈夫無法在經濟上負起責任。雖然女性認知到了收入無法帶來獨立的時候，以及雖然有些人享受在外工作的時光的時候，許多人還是選擇避開了雙重負擔。

對於少數高收入的女性而言，經濟上的自主與能動通常被詮釋成是個人選擇而非必要的，往往是一種個人的實現。但是，這樣的詮釋不是沒有社會和心理上的代價的：婚前的

勞動旅性，特別是離家出外有不錯收入的工作的時候，總是會有閒言閒語，會有嘲笑，會有詆毀，這會造成負面的情緒，影響其個人聲譽，使得結婚反而相對困難。

在好的方面，研究顯示了世代的變遷。年長的女性多數留在暴力的家庭中，認為受苦是一種美德。年輕的女性則通常不認同婚姻暴力，認為女性應該要更平等，像是回到原生家庭，或是少數獨自成立家庭。雖然可以離婚，單許多女性仍然會屈就壓力而留在暴力的婚姻中，更多的女性似乎找到了一種在家抵抗的策略。的確，收入是更可以讓女性離開暴力婚姻，即使這不必然會發生就是。

總之，我的研究發現了女性的經濟參與不保證賦權。雖然經濟可以帶給女性談判的籌碼，但是是有代價的。巴基斯坦的女性有越來越多人進入了勞動力市場，但是工作都是低薪沒保障的。要賦權女性，就業市場要有結構性的轉變，女性需要高薪和好的工作，而性別權力關係必須改變，讓男性也負擔家務，且女性的社會流動和自主要被廣泛承認。■

來信寄給 Nida Kirmani
<nida.kirmani@lums.edu.pk>

> 移民中的離婚

Kaveri Qureshi,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在英國的巴基斯坦結婚典禮。未婚妻等待未婚夫的到來。Kaveri Qureshi攝影。

——▲ 十八歲的 Sukaina 是住在 London 的巴基斯坦人。她十八歲的時候嫁給了一位在——▲ Lancashire 表哥，然後二十多歲的時候就有 3 個小孩。但是即使生老三之前，婚姻就觸礁了。她先生開始當計程車司機，工作時間不定，又長跑外面，後來和一位英國的白人前女友再度搭上線，然後又酗酒，吸毒。她忍耐了 6 個月不告訴父母，因為「他們認為她的婚

姻是完美的，因為有三個孩子，所以高興得很。所以我想我不能讓他們心碎。」所以他又等了兩年才離開 Lancashire 的夫家到 London，又等了兩年才訴請離婚。

英國的巴基斯坦裔就像許多其他南亞的家庭一樣，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傳統家庭文化的堡壘，有最高的結婚率和最低的離婚率。像是 Sukaina 的故事因此很常被規範性的刻板印象所

>>

遮蔽，隱藏。外部人也都這樣描述巴基斯坦裔家庭。2007 年花了兩天在 Birmingham 與巴基斯坦裔的家庭相處，當時的保守派領導大衛卡麥隆稱讚英國的亞裔家庭「不可置信的強韌與祥和」，說「我認為主流英國應該更整合英國亞裔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反過來。」

使用弱勢族群四國調查的資料，這是於 1990 年代中期收集的，量化 Richard Berthoud 學者發現英國南亞裔的家庭離婚率是 4%，比白人的 9% 的一半還少，甚至比加勒比海黑人的 18% 的四分之一還少。Berthoud 把英國南亞家庭看成是「傳統」、「忠誠」於其歷史背景的，抵抗個體化的潮流，然而，英國的勞動力調查 (2010-2013) 則顯示今天有 10% 的英國巴基斯坦穆斯林和印度錫克人是離婚的，孟加拉穆斯林是 8%，印度穆斯林是 7%，印度教徒是 6%，而白人是 20%，加勒比海黑人是 27%，混合族群是 23%。雖然南亞仍然更少比例回答調查問卷，但是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孟加拉穆斯林、印度錫克人的離婚率是上升的，接近了更早之前的白人離婚率。那時紀登思就關心英國的分居和離婚社會是一個更廣泛的議題。

以民族誌研究為基礎，於 2005-7 和 2012-14 在 London 和其他地方 Peterborough 都市所進行的研究，我認為移民的離婚狀態增加是從抗拒再婚開始的。我訪談的 52 位離婚者之中，30 位再婚，22 位沒有，而這 22 位中只有 6 個是男性。Sukaina 是沒再婚的例子，且相當堅持。Sukaina 離婚後受憂鬱症之苦好幾年，但是透過兄弟姊妹的扶持，她繼續進修，成為助教，找到工作，不再依賴社會補助。她不再是一位夫家眼中的好媳婦，不顧父母建議的再婚建議。「我一開始很恨男人，真的很恨。我不能忍受看到他們，甚至聞到他們的味道。」Sukaina 說。有些離婚者告訴我她們再婚是為了給小還有一個正常的雙親家庭，但是像是 Sukaina 這樣的人來說，再婚只是更糟的選擇。

若某個女性和男性在離婚後分居，那再婚者是更可能選擇自己的另外一半的。67 個受訪者中，58 個是被安排的傳統婚姻，而只有 9 人是自由戀愛結婚。相反的，49 位再婚者中，只有 20 位是被安排的，9 位是半安排的自由戀愛婚，因為其實自由戀愛，但是裝飾成是安排的。而有 20 位是自我安排的戀愛婚。因此，再婚似乎更可能包括了婚前追求和親密關係的建立。這些自由再婚者也都被家庭更廣泛的接受。

Sukaina 的經驗說明了另外一種傾向：再婚通常是跨種族、族群、階級、宗教的。幾乎十年來沒有另一半的生活使得 Sukaina 和 Sukh-

winder 談起了戀愛，Sukhwinder 是印度的錫克離婚者，同意改宗為伊斯蘭，而且兩人的婚姻是由伊斯蘭的儀式進行，只有 Sukaina 的姊妹們和三位男性見證。這樣的婚姻聽在自由派的眼裡好像很棒，但是 Sukaina 很失望，因為 Sukhwinder 沒有顯示任何改宗的嚴肅傾向，也沒有拿下錫克教的頭巾。結果 Sukaina 沒有勇氣告訴其父母親這個再婚的決定。

我發現二度婚姻時常並不穩定。30 位已婚受訪者中有 9 位的再婚者已經又離婚且要三度結婚，且許多二度或三度婚姻的受訪者常常是充滿衝突的，這讓我們認識到了婚姻社會學是對再婚認識不多的。我們需要不僅僅是關於離婚，還要非正式關係和再婚的研究。也需要關於婚姻規範如何隨著遷移、跨國、移民而變化，而這些傾向被看成是把「留下」的文化看成是鐵板一塊。我的研究指出了，這在過去並非如此，現在也不是。■

來信寄給 Kaveri Qureshi
<kaveri.qureshi@lums.edu.pk>

> 恐伊斯蘭症與英國的反恐安全政策

Tania Saeed,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Arbu繪圖。

英國的教育機構愈來愈配合政府的反恐安全政策。在所謂的反恐安全法案 (CTSA) 之下，教育機構有「規範義務」要通報那有風險會激進化的學生。而激進化的指標是很難去定義的。清楚的是那些「社會性脆弱」的學生很有可能是穆斯林。更有問題的是，非暴力的極端思想也有可能被懷疑，只要是和「英國價值」違背的都會。結果就是那些想法會消音，而不是被挑戰或是辯論。

2015 年的反恐法案是在 2005 年 7 月 7 日的倫敦爆炸所訂定的。其他反恐安全政策也都鎖定教育機構。穆斯林學生很常被懷疑。按照英

國政府的報告，防治策略 (2011) 的安全人員已開始和教育機構去合作監視學生。有些案例，像是倫敦大學的校友 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 試圖攻擊飛往美國的班機。另外一個前學生 Roshonara Choudhry 則砍刺英國政治人物為伊拉克人民報復。年輕學生加入 ISIS 則讓人更對於穆斯林學生感到困惑。但是新的法案讓大學監控成為法律責任。這樣的政策不和穆斯林學生互動反而會異化穆斯林學生，諷刺地開啟了一種更不安全的氛圍。雖然男性穆斯林被認為比較有立即威脅，穆斯林女性則被看成不是受害就是激進，躲在面紗之後。

在 2010 和 2012 年之間執行的一樣研究分析了 40 位年輕英國穆斯林女性學生和校友的敘事，探討其恐伊斯蘭症和英國反恐安全措施的經驗。這個研究在巴基斯坦被高度懷疑的時候進行的，包括了那些巴基斯坦的二代英國移民以及巴基斯坦的留學生。女性穆斯林則涵蓋了不同的「宗教性」，從面紗 (niqab)，頭巾 (hijab)，長罩 (jibab)，傳統巴基斯坦服侍 (kameez) 和褲子 (shalwar)，還有沒有任何外貌打扮的穆斯林。該研究聚焦在伊斯蘭學生組織 (ISocs) 的經驗，該組織被批評為無法遏止校園的激進化。福利官員，學生代表，伊斯蘭學生組織的幹部也都接受訪談。

女性的經驗主要是服裝上面為主。不令人驚訝的，niqab 最受到目光的注意，年輕女性有被大叫是極端主義或是賓拉登的妻子的經驗，面罩變成是一種外來宗教認同的符號。也有受訪者說有被種族主義的話語操擾，特別是用「雷思邊」攻擊那些 niqab 或是 hijab 的穆斯林。這也反應了異性戀的恐伊斯蘭文化。相較之下，沒有特別宗教認同的穆斯林女性則感覺不夠穆斯林，因為沒有人注意她們。巴基斯坦的外貌挑起了文化上被壓迫的刻板印象，未受過教育的女性則是支持殺戮和逼婚的文化的犧牲者。

和這樣經驗奮戰的學生是包括了校園或校外的都有，但是 ISocs 的成員別會被挑出來。男性和女性的成員通常要防衛自己，那並只是因為對抗校方對他們的舉辦活動懷疑，還是因為要對抗自己宣稱的「溫和」穆斯林身份認同。

>>

受訪者描述「溫和」穆斯林如何避免了 ISoc 的活動，因為害怕會變貼標籤，而 ISoc 的學生則被稱恐怖分子，認為有可能被情報單位監視或是間諜滲透。許多受訪者也說到害怕被貼標籤會導致自我的言論審查，也因為怕被說幾近而避免某些政治活動。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網絡也顯示了另外一種脆弱，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變成「高度安全化的」，因為巴基斯坦認同被懷疑，由於有「反恐戰爭」正在巴基斯坦開打。有些學生或許避免掉了一些和巴基斯坦有關的政治，但還是會捲入有關阿拉伯之春或是巴勒斯坦的議題。其他則說有時會掩蓋自己的真正認同，這特別在 2005 年 7 月 7 號後是如此。

這些研究發現顯示了不同的穆斯林社群可能經驗到的安全論述是不一樣的，不只是因為宗教性，也因為不同的族群和民族認同。美國總統川普的 2017 年穆斯林禁令針對了某些穆斯林國家，像是敘利亞等國，這也讓不同認同的穆斯林在不同的社會政治脈絡下有不同的反應。

若是宗教性的程度導致了懷疑的歧視的程度，研究也顯示了年輕學生積極的去反抗那些刻板印象。透過「認識伊斯蘭週」的活動，或是簡單的挑戰對伊斯蘭的先入為主的認識，穆斯林的學生試圖要改變公眾態度。當有些學生拒絕宣稱「正常」或是清白這樣的心裡負擔的時候，人們不能不看到那些穆斯林或是非穆斯林的學生是如何反抗那些政府的安全政策。

許多大學知道要盡到「妥善照顧」學生的責任，也就是確保「言論自由」和「規範義務」，要通報有「風險」會激進化的學生。然而，這樣的「照顧責任」時常有所妥協，就像在 Mohammad Umar Farooq 的例子一樣，他是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 的學生，他被學校通報說在閱讀恐怖主義研究的教科書。Rizwaan Sabir 被通報去下載蓋達組織的手冊（在書店已經可以買得到了），但是他是在做研究，其他還有許多被錯誤通報的例子。

大學將會繼續被納入英國的反恐安全計

畫，就像英格蘭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所要實施的 2015 年的反恐安全法案規範義務。穆斯林學生的受訪者表達他們若是不被時時監控的話，是願意和執法人員接觸的。他們也認識到了雖然許多年輕英國穆斯林拒絕 ISIS 這類組織，但是問題還是很重要的。的確，許多受訪者願意接受這樣的挑戰。然而，讓所有的穆斯林都成為可疑對象，強加一種不安全的文化且讓爭議性的觀點被閃避掉，這樣一來大學開啟了一種讓穆斯林學生成為恐伊斯蘭症的歧視對象，所以大學是沒有盡到對伊斯蘭學生的「照顧責任」的，且有可能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來信寄給 Tania Saeed
<tania.saeed@lums.edu.pk>

> 基礎建設的政治

Amen Jaffer, Lahor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Sciences, 巴基斯坦



垃圾收集者正在找可回收物，並且在Ozpak 廠商來之前要找到。Khurram Siddiqi攝影。

自從 20 世紀的最後 10 年，巴基斯坦的經濟已經被私有化和去管制化所轉變了，這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秩序，並且由不同政黨組成的政府和軍人專制所支持的。然而儘管政治精英對此有著高度的共識，執政的巴基斯坦穆斯林納瓦茲聯盟 (PML-N) 和其他政府不一樣的是，它們聚焦在基礎建設上面。從 1990 年代開始，PML-N 政府已經建立了他們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策略，圍繞在「發展」基礎建設上面，包括最近的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 (CPEC)，這被政府讚許為「革命性的政策」，將會徹底拉起巴基斯坦的經濟。

巴基斯坦政府承諾這些道路、鐵路、能源的基礎建設計畫——主要是跟中國政府貸款然後由中國的公司執行——將會帶來國外和國內的鉅額投資，創造工作機會給巴基斯坦人民。

但是這個經濟策略是奠基在這樣的假設上面：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支出將會刺激經濟發展。儘管沒有什麼證據支持這樣的假設，像是在 PML-N 政府於 1990 年建造的 Lahore-Islamabad 道路就是如此，甚至還有許多國外的案例說明了大型基礎建設只是上外國投資廠商獲利。在一個有著不健全公共服務的國家，教育和健康

都是全球最糟糕的地方，這種大型基礎建設根本是忽視人民的基本需要。雖然稱之為基礎建設，那些建設都是蓋給大公司的，忽略且讓非正式部門受害，而這些是多數巴基斯坦人民的工作所在，結果只是惡化的經濟不平等。

以 Lahore 的固態污染排放物管理為例。2010 年，Punjab 政府私有化了污染排放物的收集、運輸、棄置，並成立了 Lahore 固態污染排放物管理公司 (LWMC)。這是一個上市公司。這間公司委外經營，給了兩間土耳其跨國公司經營：Ozpak 和 Albayrak，每噸垃圾付給 20 美元去把它們丟棄到 LWMC 的處理場。而道路的建設和擴建讓 Ozpak 和 Albayrak 佔了許多的便宜，因為這些基礎建設讓兩家公司的污染排放物運輸得以更有效率。

Ozpak 其中的處理中心之一位於 Lahore Ring 道路 (LRR) 附近，一個新的六線道。各處收集而來的垃圾會由卡車運到該中心，那些卡車都是大型的，裝備有舉重和壓縮垃圾的設施，而小型的道路則給比較小的卡車使用。一旦垃圾被運到 Ozpak 的處理中心時，機械卸載機器會把垃圾分大型的垃圾車上，然後運送到 LWMC 位於 Lakhodar 的垃圾場。很清楚的可以



垃圾收集的聚集地，在此分類從都市收集來的垃圾。Khurram Siddiqi 攝影。

技雖然有效，有卡車和先進技術，但是私有化整個工業的結果是犧牲了社會底層的階級。

污染排放物管理工業只是多數導致巴基斯坦不平等更加惡化例子之一，經濟邊緣弱勢群體在這個轉型過程之中並沒有發聲的機會。然而，我們還是有樂觀的理由，有些低收入社區把基礎建設轉化成公民身份的核心支柱，去要求在貧窮地區可以改善基礎設施。這樣一來，長期讓私有化產業在公共建設中獲利的情景或可改觀。■

來信寄給 Amen Jaffer

<amen.jaffer@lums.edu.pk>

看到 LPR 是整個運作過程的樞紐，讓 Ozpak 的作業節省了許多的燃料、時間、人力成本。

Ozpak 的複雜科技作業和「非正式」的垃圾收集與處理是大相逕庭的。一般的垃圾回收是透過人力、騾子、推車、腳踏車、摩拖車等方式，有些則是用挨家挨戶收取少量月費去收集垃圾的，然用人工去分類瓶罐、紙張、厚紙板、塑膠、金屬等垃圾。這些回收物被賣給小型的回收廠商，然後再賣給那些中型垃圾處理場。

然而，雖然這些廠商是回收工業的主幹，但是這些工作都是在危險的環境下進行的，回收工人是在這個經濟的底層，工資很低，並且受到刻板印象和歧視的對待。不驚訝的，許多工人都是 Lahore 社會的最底層的一群。

更有甚者，基礎建設的擴張直接或間接的讓垃圾回收工人的經濟更加惡化。Lahore Ring 道路的建立就讓這些工人受到了影響。第一，他們的運輸模式：騾子推車和腳踏車等，都不能上該道路 (LRR)，要讓那些人去擠那些很小的道路。第二，他們的工作需要時常穿越 LRR，這增加了他們的時間與距離，因為可以穿越 LPR 的地方都相隔很遠，或是逼迫他們為了省時省力只好要在不能穿越的地方去穿越，來來往往、高速行駛的車輛相當危險。所以，LRR 的建造只是讓這些工人的工作負擔加重而已。

間接地來說，LRR 則讓大垃圾公司得利，而大垃圾公司是和小型業者的利益相互衝突的。在一些社區之中，有些家戶開始停止付錢給垃圾回收工人。此外，大型公司的垃圾處理方式讓回收工人更難生存，公司把工人的傳統方式視為是阻礙。

因此，Lahore 基礎建設發展肥了大公司，瘦了傳統回收工人。所謂的污染排放物管理科

> Zygmunt Bauman 的道 德視野



| Zygmunt Bauman.

波蘭社會學家 Zygmunt Bauman 於 91 歲過世，為其傳奇重要的一生劃下句點。要總結其一生是很困難的，但是如 Keith Tester 所說的，「Zygmunt Bauman 這樣的學者是找不到第二個了，因為他是中歐和東歐知識分子世代的一員，經歷了 20 世紀的災難，這些災難是許多學者的研究主題，但是他卻是親身經歷過。」

Bauman 於 1925 年在波蘭的 Poznan 出生於猶太家庭，後來全家在 1939 年

被迫逃亡到蘇聯躲避納粹迫害。4 年之後，他加入了蘇聯的波蘭軍隊，他雖然受傷，但是還是在 1945 年回到了柏林的戰場上。

而在戰後的波蘭，Bauman 升遷很快，變成了隊長和政治官員。這個時期的 Bauman 是個理想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對於共產黨的信仰在 1950 年代早期瓦解了，因為他在反猶太的迫害中被軍隊解職了。後來他馬上轉向學術，並在 1954 年成為華沙大學的社會科學講師。他是成功的社會學家，探討了相當多的議題。60 年代他成為了社會學系主任。

然而，Bauman 似乎被政府視為改革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他質疑國社會主義，有一篇文章批評計畫的侷限性。他的立場很不確定，並且在 1968 年的另一場反猶迫害中，他和其他五位教授被解僱了，後來他和家人離開波蘭，後來在以色列，澳洲，加拿大等地兼職，後來在英國定下來。1971 年之後，他是 Leeds 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直到退休。

此後，Bauman 在英國社會學相當為人所知。其對於歐洲數種語言的了解以及對於哲學和社會學理論的掌握，使他對於當代理論相當擅長，所以 1980 年代就成為了「後現代性」的重要人物。然而，Bauman 很快地了解到被歸類為後來成為去政治化和保守的這個知識架構的危險。

為了保持對於社會秩序的批判，Bauman 展開了對於「液態現代性」的探討。《液態現代性》(2000) 一書出版之後，他研究了市場化和個體化的影響如何鑲嵌在新自由主義計畫之中，並且對於這帶來的苦難與傷害有著很高的敏銳度。

Bauman 晚期作品的核心關懷是現代性。而最主要關於這個主題的書是《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這本書獲得了 Amalfi 獎。此書著重在邪惡的能力如何在現代性計畫中作為基礎，透過「理性化」的組織技術穿透社會。此後，其作品都圍繞在道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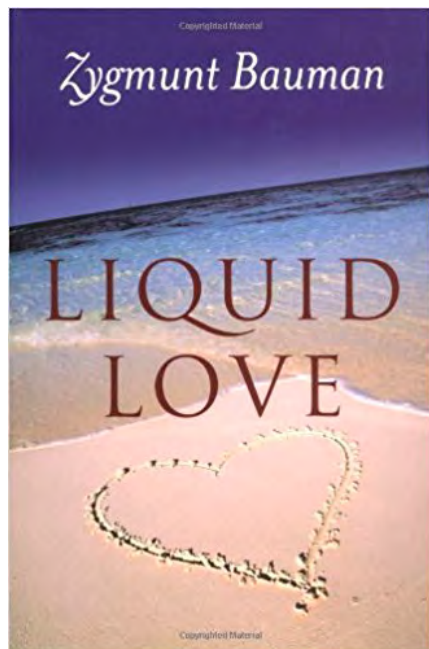
在 1993 年出版了《後現代倫理學》之後，Bauman 在倫理社會學領域變得相當有影響力。他對於傳統社會學對於道德的解釋是質疑的，被且被 20 世紀發生的慘劇所啟發——他也親眼目睹了一所以 Bauman 和哲學與神學家 Emmanuel Levinas 的作品有著很深的對話。這也讓他發展了所謂的道德現象學，道德行動是基本的行動，先於社會化而存在。

Bauman 對於倫理的研究相當的有爭議性，因為其通常被認為視對於社會學家的挑戰。但是 Bauman 的社會學的（而非哲學的）對於制度的權力和企圖對於人類知道德能力的限制，式非常精闢和重要的。其著作將會繼續被那些希望社會學不僅僅是管理科學的社會學家所閱讀。■

Peter McMylo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英國

> Zygmunt Bauman

懷疑的烏托邦



Zygmunt Bauman 的自傳可以相當輕易地被整合到波蘭知識分子階層的 20 世紀的故事之中：在歷經了可怕的戰爭之後，迷上了共產主義的信念，整個世代的知識分子都試圖要去修補實存的社會主義，不過在發現共產黨的獨裁本質後，都幻滅了。後來，知識分子也參與了 1989 年的共產黨瓦解的歷史。最後取得勝利，然後教導人們如何行使得來不易的自由權利。

不過還好 Bauman 的故事不是這樣的。雖然他沈浸在這大歷史之中，他從來沒有順從歷史的洪流。他對歷史脈絡的脈絡相當敏銳，並且也知道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Bauman 的觀點可以被定義為懷疑烏托邦主義：Bauman 透過分析社會秩序去揭露烏托邦的元素如何維持的宰制的結構，但是他也要求烏托邦去強化其批判，並且訴求社會變

遷。其觀點的根源於 Bauman 自己的波蘭戰後的個人經驗之中的。

> 史達林主義，異質的經驗

至少在波蘭，戰後知識分子階級對於史達林主義的信念的主流論述可以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Czesław Miłosz 的《Captive Mind》一書中看到。這本書呈現了波蘭受教育階層如何缺乏宗教信仰和被虛無主義所害。而共產主義填補了知識分子們的這部份的心靈空白，因為共產主義提供了其一種整權的世界觀，並且給予了知識分子重建世界的希望。馬克思主義有足夠的複雜度去吸引那些知識分子，並提供政治權力和人民的親近性。Miłosz 描述了知識分子對於共產主義和史達林主義這種半宗教意識形態的崇拜與迷戀，因此解釋了為什麼年輕的知識怎會那樣的熱情投身到新的社會主義系統之中。

這樣的故事部份和新的文化精英經驗深深投入史達林主義之中是吻合的，但是這沒也辦法用來解釋所有的例子。對我們來說，Julian Hochfeld 是特別重要的，因為他是年輕 Bauman 的榜樣，也是華沙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圈的領袖，這個學派還包括了 Jerzy Wiatr, Maria Hirsztowicz, Włodzimierz Wesołowski, Aleksandra Jasińska-Kania。

在 1950 年代開始，Hochfeld 訴求要把社會學從大學中拿掉，因為那是布爾喬亞精英的科學，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容身之處的。Hochfeld 不必

然符合 Miłosz 的描述，因為他是一位戰前的科學家和運動分子，隸屬於波蘭社會主義黨 (PPS)，其在戰後希望可以運作一個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黨。當史達林決定要剷除所有的政黨的時候，Hochfeld 促使 PSS 要去加入波蘭共產工人黨，後來在 1948 年成為了波蘭共產工人聯合黨。Hochfeld 對於史達林主義的信仰不是來自於意識形態，而是基於看到日漸縮水的政治空間下所做出的策略性選擇。他希望可以繼續其政治活動，但是這個希望沒能實現。儘管始黨員也是議員，他很快被邊緣化了，因為他持續批判共產黨和史達林。Hochfeld 呼籲要分析社會主義下的異化，並且試圖去分析議會如何和民主集權主義互補，所以他成立的一個期刊：Socio-Political Studies。

Bauman 看到其導師這樣的經驗，是有被影響的。雖然 Bauman 是站在冷戰的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反對資本主義的，其寫作卻是有些相反。Hochfeld 的例子讓 Bauman 在兩條線上作戰。他作為一位社會主義社會學家是批判資本主義的，並且也拒絕社會主義的形式。

> 對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批判

在 Bauman 於 1968 年之後的作品裡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被當作工業化社會。這代表了大量的生產，工人階級的形成，以及科層化組織。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不能被理解成完全不同於社會主義社會。

Bauman 的作品於這個期間是企圖要融合西方社會學的科學傳統到波蘭文化之中的，目的是要去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個社會是和資本主義不同的，無論在所有權的組織上，階層建立的機制上，以及現代化的概念上都是。資本主義中，這些是發生在資本家的獨裁之中的，而不是共產黨的計畫。而鐵幕的兩端都歷經了權力的腐敗，勞動的異化，個體和集體之間連結的消失。因此，Bauman 在他的 1964 年的《Sociology in Everyday Life》（後來稱為「社會學動動腦」）書中論證社會學應該批判地看待這些過程，不只對決策者對話，也像一般民眾對話。

Bauman 的路徑是有風險的，在 1965 年，他站在被鎮壓的學生那邊，加入 Kuron 和 Modzelewski 寫的《The Open Letter to the Party》的陣營，那是一個改革派。Bauman 被視為黨的眼中釘，並且因為因為反猶主義的興起而被整肅。像是其他猶太人，Bauman 被迫流亡。

＜社會學家的烏托邦角色

Bauman 離開波蘭標示了他長期沉默的開始。這和他之前對於反猶主義的發聲很不一樣。之後他的第一本書，《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定義了 Bauman 後來的研究和一位批判的社會學家。不像許多其他的波蘭知識分子，像是 Leszek Kołakowski，Bauman 並不拒絕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想像而支持去反對極權主義。同時，對個體的注重也是現代消費社會和訴求社會變遷的運動的特徵，並且造成了兩種宰制：核心和邊陲之間，以及國家之內的全體不平等。

Bauman 接下來的活動可以被看成是《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一書的延續。這本被廣泛閱讀的關於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書揭露了對於烏

托邦的懷疑。其認為，對於可以開創一個可預測和透明社會的這樣的信念，其實是暴力的根源，也被國家所組織去對付那些不適合於這個社會的人。在當代的後現代烏托邦社會中，這樣危險觀點是被禁止的，但是這並不意謂著我們可以忽略烏托邦的負面影響，包括了相信個體有能力去完全自由創造自己，在市場上選擇。Bauman 在《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一書之中描述了這樣的烏托邦承諾的吸引力，但也討論了其風險，包括了尋求完全真實的認同、對於專家的依賴，以及把個體簡化成市場元素的危險。

除了共產社會下的負面後果之外，Bauman 也指出了那些被這個系統排除的人。那些仍然被忽略的人一直被排除在社會之外。那些窮人，無家可歸，移民，難民等等，Bauman 稱之為被浪費掉的生命。批判的目的是讓那些人被看見，提醒人們那些人是需要幫助、保護、尊重的。把我們和他們連結在一起的不是物質利益或是政治利益，而是倫理。這是奠基在人性之上的。

Bauman 定義其工作是烏托邦夢想的詮釋者，並且和東歐知識分子階層做出區隔，因為他們是社會主義的教導者。Bauman 說明了，雖然社會學家應該理解社會生活的動態，但是也要站在社會邊緣的那邊，因為那邊是被剝奪掉人性的。■

Maciej Gdula,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 懷念 Zygmunt Bauman



Zygmunt Bauman和Peter Beilharz。Sian Supski 攝影。

當 皇帝駕崩，有人哀弔，也有人忌妒。這是政權過度時期嗎？而 Bauman 是皇帝嗎？當然不是。他是晚期成名的學者，不情願的名人，對曇花一現不報期待的人。就像他說的，理解是不可能一蹴可幾的。他重要但非主流。他同時是局內也是局外人。

Bauman 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是關於英國的勞工運動，在 1972 年出版。他因為這樣被 Edward Thompson 邊緣化，並且持續了好幾年。他被同事忽略，然後只好引用自己的文章，開創自己的社會學，透過隱喻去分析社會。

可是 Bauman 在世界上卻被廣泛閱讀，讀者來自各地，而且接受到他深深的影響。或許這就是忌妒的源頭吧。Bauman 從註腳中走出，成為議題。他不再為可能閱讀他的同行們寫作，而為賭徒、為日常生活的通勤者寫作。他是生活的資料，也是二十世紀經驗的素材。他鼓勵我們去把世界的問題看成是自己的問題，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知識分子的工作是去問問題，而不是替那些擁有問題的人解答，包括貧窮、流動、受苦，甚至愛、失去、忠誠。

或許我應該講個故事。因為，若 Bauman 不是個說故事的人，那他應定是個對話者。25 年

>>

來，我每年到 Leeds 造訪 Bauman。上次見到他是 2015 年，那時是他 90 歲生日，我那時在南非的 Stellenbosch 工作，而那時他出現在南非，就像個老間諜，在我們到 Cape Town 之前出現。然後飛到 Manchester，然後做火車經過 Pennines 到 Leeds。（我很懷念上次生日，那時我們在成都，那時我們去談 Bauman 家庭，他和老婆 Janina。中國人也對 Bauman 很感興趣。）

出發到中國之前，我在寫一篇關於 Bauman 的文章，是要發表到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的。Bauman 吸引我的地方是，30 年來，我從來沒有對他失去興趣。當我從 Stellenbosch 的圖書館借來《立法者與詮釋者》時，我發現每頁都充滿的註釋，這讓我很享受。然後我接觸到了《液態現代性》。第三章是「時間 / 空間」。這章從 Bauman 到南非開始，事實上是 Somerset West，就在我工作的附近。而主題呢？門禁社區，這後來成為了一種藝形式。而他的研究計畫對象：Heritage Park 仍然未完成，就在 N2 高速公路旁，從 Lwandle 開始，那是一個黑人的歷史光榮社區。主人與奴隸、觀光客和浪人，Bauman 的目光從 Leeds 到了南非。

他皺眉，淘氣的問：我有從圖書館偷過該書嗎？我說沒有，我只有借過。於是我們一起在 Lawnswood 花園檢視那本書。這是一條從 Somerset West 而來的漫長道路，然而或許也不是。現代性和其黑暗的一面一起旅行呢。

我很榮幸有機會成為 Bauman 的詮釋者。像他說的，我們工作是去把他混亂的研究中找到秩序。他是個有力的作者，有 58 本英文著作，這是個豐富的遺產，是這個液態現代下的問題的豐富詮釋。

所以這會是我對新進人員的忠告，就是把 Bauman 任何書中的議題拿來，然後看看會怎麼衍生。或許像是 Simmel，他是個社會學印象派，是生活碎片的分析家。但是他總是隨著馬克思，所以他的興趣可以稱之為是座落在文化與關係中，不對稱的生產、分配關係。然後，像是葛

蘭西一樣，他放棄認為我們可作得更好。

現在結束了，那他會怎麼總結自己的作品？就我的經驗來說，我好幾次嘗試要去概括他的作品：批判現代性的過多性，剩餘人口的社會學，另類現代性的理論，包括納粹德國，或浪費的社會學。更傳統的說法，或許可以稱沒有虛幻的現代性批判，東歐批判理論，而且東方在這裡有點重要。或是韋伯馬克思主義者。這裡還有其他的，像是分類理性的批判。最近的作品或許可以被稱之為時間的診斷，時間象徵的批判，一系列從希望精神中發出的警告。

他是個例子嗎？當然。但是他不是個領導者。他的例子清楚說明了我們都應該走自己的路，這是唯一讓批判社會學繼續下去的一條路。

Peter Beilharz, Curtin University, 澳洲

> 非社會學時代的社會學

Howard Ramos, 加拿大社會學會長, Dalhousie University; Rima Wilkes, 加拿大社會學侯任會長,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Neil McLaughlin, McMaster University, 加拿大



| Ariane Hanemaayer攝影。

世界在過去幾年來，本土主義興起，排外主義抬頭，英國脫歐公投，以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世界充滿了後事實、假新聞、假報導，把社會問題歸因給個人。簡化、原始、個人主義的社會問題歸因大行其道，深深影響了社會文化。

漸漸地，社會學的取徑被世界上的領導人所屏棄。法國總理 Manuel Valls 就是個例子，當被問到關於對於原住民女性的暴力與恐怖對待時，他說社會學是一種「找藉口的文化」。社會學看起來似乎是個不入流的學科。

許多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還有學術圈外

的人，都沒有辦法看到社會學的用處。越來越多人餅器用社會學的方式去理解暴力的源頭與社會根源，或是去平衡造成難民、貧窮、不平等的環境，因為那被認為是允許暴力與極端主義。這樣的看法讓亞洲和拉美的系所關門，也意謂著社會學是次於其他社會科學，像是經濟學和心理學的。

我們相信社會學在接下來的幾年是重要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是需要用更廣泛的結構和歷史角度去分析的，社會學可以扮演這個角色。

但是要能有效達成這個目標的話，整個學

科必須去隨著時代而改變。社會學家要更多元，這不只是人的部份要如此，還包括理論、想法、實踐、應用的多元。許多圈外人認為社會學太過道德傾向，只提供了會吸引左派的社會問題解答。

我們將會從其他學科的視角獲得助益，也會由於對保守的聲音開放，並接納實驗和新潮的尖端方法，像是非母數統計模型，機器學習，適應系統模型，視覺分析，詮釋質化分析等。這樣一來這個學科會吸引新的觀眾。

社會學家也需要和更廣大的公眾去互動，包括那些不同意社會學論點的人。社會學家通常被認為用學術術語黑話，像是「社會建構」，讓論證變得無法反駁。為了避免被貼上精英的標籤，被疏遠，我們要轉譯我們的知識成日常生活的語言，吸引那些學術圈外的人。

社會學介入的機會也是很重要的，並且要快。社會家要珍惜那些已經造成的改變，聚焦在新浮現的社會問題，而不是困在這個學科認為自己已經知道的事情上面——工業革命之後的社會理論。若要處理嬰兒潮的經驗，那就必須如此。

我們必須去處理那些長期以來的社會議題，像是階級不平等，或是和原住民的和解，去殖民化等，此外還有氣候變遷，人工智慧的興起，性別規範與期待的改變，以及寡頭統治的復辟。

在這期的《全球對話》中，加拿大社會學

家 Daniel Béland, Fuyuki Kurasawa, Patricia Landolt, Cheryl Teelucksingh 和 Karen Foster 展現了社會學如何可以貢獻給公共政策和知識動員，以及對於各種不平等、公民身份、環境等的分析。即使在非社會學的時代，社會學還是可以引領知識界。

我們對我們的知識限制抱持謙卑的態度，尊敬那些我們不同意的聲音，也對我們研究結論可能帶來的驚訝保持開放的態度，社會學如此一來可以形成一種社會知識，讓人可以在社會中順利行動，也幫助發展出各種社會問題的永續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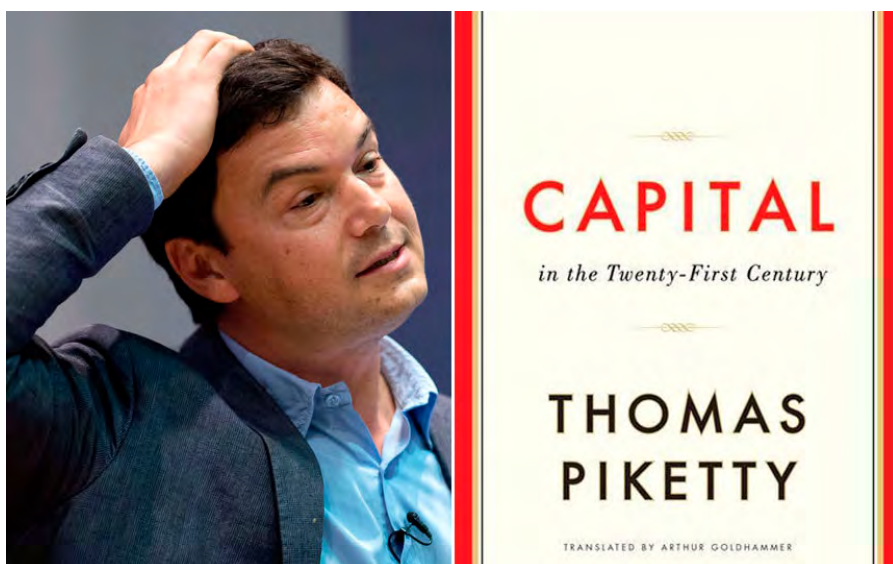
來信寄給 Howard Ramos <howard.amos@dal.ca>

Rima Wilkes <wilkesr@mail.ubc.ca>

Neil McLaughlin <ngmclaughlin@gmail.com>

> 貢獻社會學於 公共政策

Daniel Béland, Johnson Shoyam政策研究所, 加拿大, ISA貧窮、社會福利、公共政策研究委員會 (RC19) 會長



Thomas Piketty, 研究不平等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正在偷走社會學的牛肉嗎？

世界上多數的國家中的政策領域中，社會學比經濟學還要不被重視。這在加拿大總理 Stephen Harper 的輕視反對「社會學投入」中清楚可以看到。作為一位在加拿大政策圈中的社會學家，我每天和經濟學家互動，也引用他們的文章。經濟學讓人驚訝的是他們可以用複雜的理論和方法去討論具體的政策問題。

但是這個對於政策建議的重視是主流經濟學的強項。經濟學是有盲點的。關鍵是其會排擠社會學長期關注的問題，讓跨學科的政策對話更加複雜。

仍然的是，若是社會學家希望進入政策場域，若想要影響政策辯論，若想要讓社會學更相關，那就必須效法經濟學。社會學要去指出政策的影響，並且想想怎麼去傳播給政策制定

者。

這項任務特別重要，因為經濟學家正在入侵那些社會學家曾經擅長的領域。儘管有例外（加拿大 John Myles 的社會政策研究和 Gérard Bouchard 和 Victor Satzewich 的移民政策），社會學家並不被看成特別對政策建議有幫助。甚至在不平等這個社會學主導的領域也是如此。之前許多主流 (i.e., 非馬克思主義者) 經濟學家並不關心不平等，因為那和新古典的模型不吻合。但是最近經濟學家開始去看不平等，提供清楚的政策建議。Thomas Piketty 的《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3) 已經受到政策圈廣泛的注意。因為這是被經濟學家所撰寫的，以及政策界長期被經濟學所主導，Piketty 的論述比社會學家還要受到關注許多。

儘管或許由於這些原因，社會學必須額外

努力去接觸政策遊說者和推動者，以及決策者。社會學通常是提供批判和歷史的角度去看的不平等（討論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和演變），這也是為什麼這些聲音被聽見是非常重要的。更廣泛來說，應用的政策研究應該被重視，特別是若是社會學家想要改變世界的話。

若我們學習如何用具體政策草案和立法者打交道，他們會看到社會學是和現實息息相關的。社會學家應該和經濟學家一起交流去提供實踐的解決辦法。這表示研究不平等的社會學家應該仔細想想政策的脈絡（如加拿大給予老人的保障收入補助以及聯邦的平等化系統），考慮財政和實踐的議題，這些事經濟學家和決策者看得比較仔細的。

第二傳統上社會學家已經做很久的領域就是規範和認同的形成。而經濟學家現在正在加入。雖然 Piketty 或許是經濟學中不平等的新面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George Akerlof 和 Rachel Kranton 是支持其稱之為的《認同經濟學》的（2010）。認同經濟學聚焦在文化規範上面（關於像是性別關係或是小孩老人的對待），以及這些如何影響人類行為，這都和社會學非常相關。

雖然這和 Piketty 的學院之外的研究的知名度來說是比不上的，不過認同經濟學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因為規範和認同甚至比不平等還要在歷史上被主流經濟學家忽略得更多。從跨學科的觀點來說，好消息是至少有經濟學家研究規範和認同，這可能會邁向跨領域的對話。Akerlof 和 Kranton 的研究可以讓社會學家知道學術研究如何可以對於政策提供具體的解決辦法。例如，研究年輕人怎麼看待自己和成年人的關係可以幫助改善教育取得或是形成更有效的反吸煙政策。社會學家或許過去已經提出類似的方案了，但是認同經濟學提醒了我們社會規範和認同是政策研究的重要議題。實踐上應該鼓勵更多的社會學家去從經驗研究為基礎推動政策。

這些例子說明了主流經濟學家終於比較仔細的去觀看重要的社會現象了，但是這些議題

社會學家早就研究很久了。這些新的跨學科的機會也代表了對於政策社會學家的挑戰：這些社會學家及其他領域的同事必須要在這場遊戲中更進一步去推動政策。他們必須使用傳統和網絡媒體去接觸更多的一般民眾，運動者，決策者，去確定「社會學的投入」是政策辯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而不是政治人物可以說丟就丟的。■

來信寄給 Daniel Béland

<daniel.beland@usask.ca>

> 加拿大暴露在危險下的非公民身份

Patricia Landolt,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 ISA遷徙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委員(RC31)

社會學仍然是公共領域辯論的重要聲音，因為社會學挑戰常識對於社會議題的理解。例如，考慮遷徙和移民的例子，在加拿大以及其他遷佔國家，移民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永久的移動，而目標是增加國家的人口數量。然而遷徙社會學指出，暫時的移民卻變多了，而且政策也讓遷移導向了危險的非公民身份。社會學的視野提供了反霸權對於現在移民系統的解釋，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

全球來說，法律地位和公民身分是流動和幸福的重要決定因素。但是這也造成了不平等。最近幾年，許多國家因應移民的增多而開創了新的法律範疇，制度化了非移民身份的軌跡，讓移民花許多年的時間在不確定的法律地位下，也讓移民邁向非法化。

雖然法律之外居留和遣返移民的系統越來越多，公民身份的取得越來越嚴格，雖然每個國家不一樣，但是加拿大來說，在暫時與永久移民之間的變化關係已經造成了危險非移民身份的興起，這在勞動市場和工作經驗中可以看到。

危險的非移民身份指的是暫時或是有限的法律地位，以及差別化的融入經驗。危險法律地位指的是一個人只有暫時的法律權利在一個國家停留，而且沒有任何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危險非移民是會被遣返的，而國家可以強制居留或遣返危險非公民。

危險公民在法律限制使用資源的強況下居住、工作、學習、養家。加拿大的非公民包括了所有的移工、國際學生、難民、特殊簽證、以及任何沒有地位的人。2010 年有 120 萬到 170 萬的非公民生活或工作於加拿大，而加拿大的人口只有 3 千 4 百萬。

在加拿大，在希望移民帶來長期人口成長和希望移民只是暫時勞動的補充兩種觀點之間總是有著緊張關係。歷史上，長期目標和短期

目標之間的平衡是透過兩軌制的移民體系而得以可能。一軌是讓臨時移工只能在限制下的地點工作，限制使否可以帶家人來，限制居留時間。這個類別的移民包括了 1880 年代來建築鐵路的中國移工，1950 年代的加勒比海女性家庭幫傭，以及 1970 年代的墨西哥農業移工。第二個軌道則透過聯邦記點體系提供永久公民身分，已教育、官方語言、家庭連結等為基礎。到了 1990 年代，這兩個方式是在組織和論述上分開的。第一個方式帶來非公民，且絕大部分是看不見的，而第二個方式則帶來移民貢獻給國家建造，且常被人們所慶祝。

2000 年代聯邦的移民政策拋棄了這個兩軌制。第一，選擇技術移工的標準被限縮到那些有比較多財產、高教育、官方語言說得好的人。第二，難民、親屬移民的資格也被限縮許多。第三，移工的技術要求則降低了。最後，新的機制被設計出來去把暫時移民轉換成永久居民。雇主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媒介。簡單說，取得永久移民的管道縮小了。暫時移民遠多過永久居民。

暫時移民和永久移民之間的關係影響了加拿大的勞動市場，因為危險非公民的工人是新的景象。1990 年代之前，暫時移工集中在農業，都市、高技術產業、家庭照顧等，但是這已經變了。2011 年之前，暫時移工在每個省都有，都市和鄉村皆是，這也造成職業分散和下降。2005 年的前五大移工職業是高技術和創意產業。2008 年的前面排名產業是低階的食品製造業和建築業。

危險的非公民和工人有不同的權利，和國家和雇主的關係也有差別，但是我們對於介於兩者之間的身份理解甚少。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可遣返的非公民工人對所有的工人都是有影響的。其他國家的資料顯示對於勞動標準和工作條件都會有損害。

「危險的非公民身份正在進入加拿大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

危險非公民身份改變了工人、雇主、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也改變了公民和非公民工人之間的權力關係。特別來說，可遣返性限制了非公民工作者的勞動市場權利。當然，這在公民和可遣返的非公民工人之間的差異在 100 年前也是如此。過去和現在的差異在於這個危險的非公民身份，包括了數量上以及雙軌制的移民體系，以及在什麼程度上危險非公民被整合到加拿大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之中。■

來信寄給 Patricia Landolt
<landolt@utsc.utoronto.ca>

> 投入環境正義的社會學

Cheryl Teelucksingh, Ryerson University, 加拿大



在New Brunswick的反對石油探勘的運動者。

當全球的都市都見證了種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興起的時候，這個潮流似乎也到了多倫多，這或許令人驚訝，因為多倫多是世界上最多元文化和有最好與最壞狀況的都市之一。

去年，許多都市都發生了抗議，多倫多也不例外。全球的抗議包括了 2016 年美國選舉的前後，美國 Flint 市的水資源危機，大規模的本土抗議在 Standing Rock 原住民區和北達可他石油管線佈置，Black Lives Matter (BLM) 的挑戰等等。這些都是由千禧年世代在社會媒體或是街頭上所發起的。

類似的運動和動員也在多倫多發生了。多倫多的多數人口是在國外出生和有色人群。對某些人來說，是很驚訝看到了種族主義世界在這個多元文化的都市中發生。多倫多的 BLM

延遲了同志大遊行，抗議警察暴力，而泰米爾人的難民也封阻了公路，抗議社會和空間的種族隔離問題。

社會學不是把這些世界看成不同的經濟和政治緊張和要求運動與改革，社會學家應該要看到這些運動的連結，議題的相關性，以及政策改革的急迫性。我認為環境正義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大框架。

環境正義是一個理論框架也是一個社會運動。其找的是結合社會正義到環境運動之中。透過深化傳統排他的環境保存取徑，帶到更包容的環境主義，環境正義統合了社會和環境問題的廣泛問題，包括健康、住宅、都市規劃、警察等。

作為一種運動的取徑，環境正義利用了和民權運動有關的抗議策略：封阻、請願、媒體

>>

等，訴求進步的社會環境政策。被 Robert Bul-lard 的研究所啟發，環境正義變成了社區導向的社會學範例，對於今天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問題是有回應性與相關性的。

在更早期的形式，環境正義聚焦在彰顯空間的不平等分配與風險，特別是那些邊緣化、種族化、低收入、原住民人口。加拿大的這個過程包括了強制給不好的基礎設施的殖民遺緒命名但卻沒有取得原住民的同意。這樣說來，對於權利、健康、風險的生態系統的關懷開啟了各種正義議題的連結，並且讓原住民的抗議石油管線經過北達可他州的 Standing Rock 有更明顯的理由。

在都市中心的環境正義，包括多倫多，已經提供了現狀問題的一種分析架構，可以去找出不平等發展問題的解答。這樣的潮流連結到了系統化的對於種族化的低收入社群的遺棄，導致產生更少的綠地和更少的健康食物，我們也沒有負擔得起的房屋，平價的公共交通，但是卻有更多的警察和污名。

加拿大的環境社會學家，像是其他國家的一樣，是在探討環境的 NGO、媒體、政策怎麼看待與回應那些被邊緣化的加拿大人的需要。這些研究彰顯了環境不正義變成了誰得到資源以及用什麼方式得到這些資源。

不平等的資源分配和權力分配是可以結合社會運動的主題。多倫多或是世界上的白種人特權是和晶鏡、社會、環境利益掛勾的。決策的歷史面向已經增強了既有的權力結構、維持了現狀的不平等，所以那好的社區改善的時候，不好的社區每況愈下。

最近在多倫多，環境正義被用來當作抗議「Alberta 骯髒石油」的標語。當跨國企業重新把製造業設立於低度發展的國家中的時候，那裡的工資低，環境管制鬆，這種全球化連結了貧窮和種族化的面向，也就是那些在工作場合、家中、社區中最脆弱的群體。

對從事環境正義的社會學家來說，氣候變遷是一個全球的議題，在加拿大，氣候正義的政治被加拿大對於石油的依賴所複雜化了，石油被認為是經濟的推動力，而得利者傾向把氣候變遷看成是不相關或是可以管理的議題。相反的，在低度發展的國家卻有更多的脆弱群體會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他們通常沒有好的基礎設施，較大的海岸線，並且更依賴漁業，所以氣候的影響更直接。因此，加拿大是需要有更多的需要去把全球的影響考慮進去在地的環境決策之中。

合在一起來看，這些例子顯示了環境正義至少有三個面向可以讓社會學介入。

第一，社會學家要對跨學科取徑開放，因為環境正義利用質化、量化、空間、法律等方法，並且從地理學、法律、都市規劃、公共衛生、社會學等的理論角度切入。有些環境正義的研究聚焦在發掘那些受到環境風險、種族主義、其他形式壓迫的經驗和敘事。這些不被看見的經驗是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一環。

第二，社會學必須倡議社會和環境政策的改革，這在政府或是私人部門都要進行。我們對於社會和環境問題的了解持續在改變，而氣候正義的介入需要在地和全球層級的保護，保護那些脆弱的群體，受到健康、經濟、環境風險等的影響。

最後，在政策的執行之外，社會學在監督和評價新的政策中也扮演著角色，可以從一個邊緣化的群體的角度對待，這是一個可以跨邊際的研究角度。藉著使用環境正義的視角，社會學家可以幫助強化政策和社會正義世界之建構之間的關係。■

來信寄給 Cheryl Teelucksingh

<teeluck@arts.ryerson.ca>

> 在就像(從未很像)任何其他時代中的社會學

Karen Foster, Dalhousie University, 加拿大



在加拿大Halifax, Nova Scotia的一間屋子。2017年2月。Karen Foster攝影。

對許多人來說，2016年標誌了我們所熟悉的時代的終結。代表英國脫歐的民粹主義運動和川普的選舉勝利，以及菲律賓的杜特蒂當選總統，威權政府的復辟已經動搖了新自由主義民主資本主義秩序。我們也看到了「假新聞」和對「政治正確」的反動在全球興起，一個「後事實」時代正在興起。

事實似乎比不上意見或情緒來得重要。對於「他者」的包容度可說是前所未有的低，並且在重複人類破壞自然的災難。社會學在這種政治氛圍下被嘲笑與輕視，但是若我們應用社會學想像，我們可以看到

隱藏的、細微的希望，並且有頭緒知道怎麼做。

歷史的斷裂容易看到，但是持續性卻不易發現。社會學家已經找出許多斷裂，結束，開始：工作的結束、歷史的結束、甚至社會學的結束！但是這些宣稱會因為進一步的研究而有所平衡，每個斷裂總是有持續性，傅科說得很對：每一刻就像其他時間，也從未像任何其他時間。

社會學家的任務，特別是那些從事歷史社會學的學者，是去追朔那些可以連接現在和過去的事件。所以我們可以找到隱藏的原因。自由民主社會中的損失我們被迫去懷念，但

是也部份地帶著了自身的破壞潛力。重新建造一個以前的社會並不是答案所在。

即使社會學和社會的關係有著明顯的改變，透過國家、公民組織、大學等，我們也要有歷史和批判的視野。我們的學科的實踐和想法和掌權者有著複雜的關係，既不從屬於政治，卻也不置身事外。

社會學家是二戰後美國政府第一批借重的專家人士去決定國家邊界。但是許多人，包括芝加哥大學的 W.I. Thomas 被公開羞辱，因為他們的國際主義、國家認同、社會秩序的想法和 Allies 的國際主義觀點相左。

重要的是，戰後的政策制定圈拒絕了 Thomas 和其他社會學家。那些學者並不會因為要與政府合作而在研究中妥協。他們和窮人、移民、弱勢等合作，起起了保護那些群體的制度設計。

社會學和政府與運動的交手有些是很令人憤懣的。像是優生學運動。即使有些歷史看起來是好的，像是本世紀中和人力資源關係學派的親近性，但是社會學也在這個工業社會中的壓迫扮演著角色。

那些需要被檢視的歷史例子是因為若我們害怕威權主義或是法西斯主義的復甦。我們現在擔心社會學作為實踐，那最會的狀況發生的時候，社會學是一個需要檢討、改進、強化專業倫理的學科，才不會讓我們的學科為不正義服務。社會學對威權主義很了解，但是從未有辦法完全抵抗之。

社會學家必須承認社會學從來不是單一的，也不是隔絕於社會制度和力量之外的。作為知識、方法、理論的多元組成，他不可能滿足所有人。

考慮美國總統大選的後果：沒人想聽社會學的解釋，但是社會學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的書《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就分析了川普的支持者，變成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

Hochschild 最新的著作是研究鄉村的口，但是卻對政策有著很大的意義。政策制定者

若關心邊緣群體，那些人因為全球化而受害，那就是要去正視他們受到的傷害。例如，經濟成長的渴望所帶來的代價，出口導向的經濟，以及大就是好的思維。這些都不合時宜了。政策制定者也要看看忽視及提行為、價值、規範、信念等的後果。

大眾、學術人、政策制定者都在建立另類的經濟思想，也越來越多的研究和運動在質疑環境和經濟的現狀，以及永無止境經濟成長。國際上，越來越多的社區也都致力於把經濟成功像是 GDP 等引導了許多政策的標準去穩定化，這樣的努力是有可能開啟「其他世界」的可能的，雖然他們也可能會落入無止盡的惡性循環。

那就是為什麼社會學家的工作沒有結束的一天，對於社會學知識的渴求還是存在的。若我們理解到我們的想法已經失焦了，或是我們的學科已經沒落了，那我們必須去對於既有的改變有更精準的認識。這樣的精確度唯有透過心靈的質地讓多元的社會學一致才得以可能：那就是社會學的想像。

來信寄給 Karen Foster
<Karen.Foster@Dal.Ca>

> 動盪時代與媒體的交手

Fuyuki Kurasawa,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 ISA社會學理論研究委員會委員(RC16)



邀請社會學家多與媒體互動在這個時間點是特別重要的。民粹民族主義和宗教基本教義的盛行讓政治人物和名人有理由——一群其實相似性越來越高的人——去公開鄙視專業意見。社會學會遇到政治的敵視和大眾的冷淡以對，是因為我們揭露了不方便的事實，而這些事實會和主流的教條違背並將其去正當化，或是中立化（褻瀆）那些神聖或是不證自明的一般常識。

要求與媒體互動是與把媒體看成企業與國家權力的工具這樣的觀點互斥的，也和認為社會學家若上媒體報導就是膚淺與不認真的學者這樣的看法相左。過去幾年來，有所謂的「如何」與媒體交手的指導手冊，或多或少的形塑了一種認

為傳統媒體已經被時代拋棄的論點。

無論怎樣的真實核心存在於這樣的論述之中，放棄與媒體交手會讓社會學家失去大眾溝通的機會。與媒體交手是重要的，特別是這個時代中，社會學對於社會、政治、文化、經濟議題的觀點是需要被更多人聽見的。

此外，與媒體交手可以成為更好的公共與專業社會學家。其同時讓我們可以接觸更廣泛的想法、意見、經驗，也讓我們去反省、形塑、表達我們的研究給不熟悉學術語言的觀眾。

從全球的角度而言，加拿大的經驗提供了可貴的一課。其兩種語言的公共領域包括且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媒體型態與

社會家的關係。其也說明了兩種社會學家參與公共媒體辯論的兩種策略取徑：專家取徑，或是公共知識分子取徑。

在英語區的加拿大，就像其它昂格魯—每州地區，專業社會學是普遍的形式。在這裡，媒體主要把社會學當作專家，像是敘利亞難民問題的專家，社會媒體導致的中學霸凌事件的專家等等。同時，就像美國和英國一樣，英語區加拿大社會學的位置是低於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的，那些領域的學者通常獲得媒體更多的注目。

此外，在法語魁北克，社會學的公共角色大過於專業領域，這和拉丁美洲以及歐陸很像，因為社會學有著相對高的社會文化地位與知識地位。社會學家從1960年代開始的「寧靜革命」開始就在民族認同和集體認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於是魁北克的社會學家會被看成是博學的公共知識分子。通常記者會問社會學像是「你怎麼看待這個議題」類似的問題。

雖然上述的觀察是從加拿大的脈絡下引申的，社會學的位置性的雙重特徵——作為專業或是公共領域——是可以普遍化

到期它脈絡的。此外，因為風險和報酬是不同的，所以需要不同的媒體互動策略，而且會得到不同的經驗。

在英語事業，社會學的正當性比較弱，主要被視為是一種專業領域，有三個建議可以用來推廣社會學這個學科。

- 理解你的位置。研究你們國家的媒體場域的意識形態和專業取向，好掌握你如何可以發揮影響力。例如，為什麼製作人或是記者會找你，為什麼徵詢你的專業意見，以及你的意見要怎麼轉換成媒體的形式？

- 擁抱不同的方式。應用媒體社會學中的代表性抽樣分析原則到訪談中，特別是你跟比較不知名的媒體像是地方廣播電台或是地方報紙接受訪談的時候。這會讓你接觸到你不太熟悉的觀眾，並且傳達出社會學的知識。

意見是廉價的，但是社會學的事實是很難獲得的。在社會媒體的時代，每個人都有各種意見。你的特殊性在於從你的研究發現中和找出事實去反證大眾的迷思，也把特殊事件放到可廣泛的社會歷史的比較脈絡之中。

對於像是拉美、歐陸、法語魁北克等地區，社會學家通常是公共知識分子，且媒體也會注意專業意見，我有兩個建議：

- 形塑彼此的互動。因為記者通常會有個事先訪問，並且重視你的意見，利用這個機會去構思一個故事的軸線與角度。建議不同研究的角度和其他也可以訪問的人，然後寄報告、資料、甚至期刊論文或書

籍過去當作後續延伸。

- 注意可能的回饋。因為你被視為公共知識分子，那麼做一個關於世界現狀或是因果的論證是很吸引人的，但是我建議把訪問拉回到你專業領域的素材。用簡明的方式著重在關鍵點，提供明白易懂的分析。

一個最後的重點是適用在所有環境的：時機是重要的。截止線和一閃即逝的新聞價值是媒體的命脈。你必須找到他們最後的要求和你的行程之間的平衡點。報導員，製作人，編輯等都不會等你有時間才訪問你，也不會到了時機錯過之後才刊登你的文章。

與其說社會學家應該成為意見領袖或名嘴，不如說我們應該和媒體合作。這讓我們去發展作為公共志業和專業學科的社會學的雙重目標，這是不同於公共關係、創業等領域的陳腔濫調，也不同於在這個動盪時代總是被視為智慧的機會主義。■

來信寄給 Fuyuki Kurasawa
<kurasawa@yorku.ca>

> 美國的大學

移民議題鬥爭場域？

Sandra Portocarrero和Francisco Lara García,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國



美國的大學生要求校園保護無證移民。

在2012年6月15日，歐巴馬政府宣佈了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政策，允許大約170萬的無證移民一小時進入美國的移民——可以有兩年的緩衝期不被遣返。DACA也延長了這些移民的工作許可，提供進入高等教育的機會。許多的美國居民都把這種不擔心被遣返視為理所當然，

所以把美國當作自己的家，心靈是平靜的，至少在緩衝期是如此。

而川普上台之後，心靈平靜轉變成了焦慮。恐懼是來自於反移民的修辭充斥著川普的選舉策略，如野火一般蔓延開來。立即影響的是DACA受惠者害怕被延長的緩衝期會被取消。但是這種擔憂有更進一步的影響：所有的移民都擔心新

>>

的移民政策會影響到他們。

這樣的恐懼是真的。2017年1月27日，川普簽字了行政命令去禁止7個穆斯林國家的人進入美國。由於這個行政命令中的用語，導致所有類別的移民、包括難民、學生、永久居民等等都被滯留在機場，導致了抗議的爆發。所有的移民突然發現美國政府會質問他們入境的理由，甚至被禁止。國務院甚至限制了上述穆斯林國家的雙重國籍人士入境。

一夕之間，影響似乎不只是無證移民而已，還擴大到了所有的移民。雖然西雅圖的聯邦 District Court 封鎖了這指行政命令，整起事件告訴我們的是川普的移民政策將會無差別地一網打盡。這在他的3月6日的新的行政命令中可以得到證明：他又禁止了6個穆斯林國家的人口進入美國，這是有史以來最嚴格的國家介入移民政策之一。

沒有什麼地方比美國的大學更可以看到這樣的衝突了。制度上，公立和私立的大學都有著多元異質的族群，包括了老師、行政人員、學生。歐巴馬政府的 DACA 政策擴大了這樣的多元：DACA 的受惠者可以註冊就讀大學，加入有著許多國際學生的課堂，選擇可能也是移民後代教授所開設的課程。沒有其它的制度像大學一樣可以聚集那麼多階級、種族、族群背景的人了。

因此，不意外的，許多大學出來反對移民禁令。2月13日，一項由16個包括所有常春藤大學所起草的法案文書進入了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要挑戰川普的行政命令。該法律文書說「安全的考量是可以透過與美國價值相容的方式表達出來，美國的價值包括了思想和人的自由移動，並且歡迎移民到我們的大學來。」

類似地，美國社會學會 (ASA) 也在2017年1月30日發布了一向聲明，反對川普的

行政命令，並且提出了如何有效進行集體動員的建議。作為社會學家，我們身處在組織的網絡中，若我們積極的合作，那麼這個網絡可以更有影響力。當一個反移民的人當選了總統，那麼學術組織將會從觀察者轉變成為行動者，像是 Michael Burawoy 說的，這是當代大學的特殊角色，同時在社會之外與之中，同時觀察也參與其中。換句話說，ASA 的聲明把社會學場域轉換成權力的場域。

社會學將會持續關注校園的移民團體的動態，這是校園內的新的景象。今天，使用並代表移民的組織是會為特定經濟和教育背景的移民發聲的，例如，農業部門會遊說爭取確保有低廉的農業勞動力和無證移民可使用，而科技業像是矽谷會希望加速高科技人員的聘用，但是美國的大學卻是有著獨特的潛力去支持移民運動並反對川普的政策。此外，合作的失敗也會有教育意義，反省合作的限制和跨校園的集體連帶的挑戰。

總之，美國公民社會正在回應川普政策的挑戰，社會學家將需要更仔細去看大學中跨移民群體的動態。或許現在還太早去評估其重要性為何，但是當時機來臨的時候，我們需要有辦法去理論化美國大學的非尋常位置，記住大學是一個多元利益交織的空間。■

來信寄給

Sandra Veronica Portocarrero

[<svp2118@columbia.edu>](mailto:svp2118@columbia.edu)

Francisco Lara García

[<f.laragarcia@columbia.edu>](mailto:f.laragarcia@columbia.edu)

> 介紹阿根廷 編輯團隊

Juan Ignacio Piovani, ISA未來研究委員會(RC07)和邏輯與方法研究委員會(RC33), Pilar Pi Puig和Martín Ur-
tasu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我們於 2016 年加入了《全球對話》的編輯，接下了之前哥倫比亞 Majo Álvarez Rivadulla 所帶領的西班牙文編輯團隊。從那時候開始，每期都是機會和挑戰，經過數週緊密工作之後，我們取得了許多的成就。

翻譯從不簡單。就像羅馬尼亞團隊最近說的，問題之一是那些從來沒有被翻譯過的新字。雖然西班牙文在英語期刊內並不少見，但是這也是個挑戰。西班牙文是 21 個國家的官方語言，有著 5 億人口，每個地區，每個學術圈都有自己的習慣用語，所以相同的概念會用不同的字詞表示出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去討論最「中立」的西班牙文概念為何，或是怎麼翻才會比較公平。

然而，語言的多重形式與接受度所帶來的複雜性卻是超過語言層次的。例如，當要翻譯一個英文概念是有明顯的對應西班牙文字的時候——自由的 (liberal)——這卻是很難的，特別是指涉政治人物的意識形態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選擇就是用西班牙文的 liberal 的相對應字。但是在西班牙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 liberal 卻是有著保守的意涵。另外的一個方式是用 progresista (progressive, 進步的) 去翻，但是在拉美的脈絡下，這個字有左派的意義。所以，用 progresista 去描術像是對於家庭價值有著開放態度、但是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軍事干預等等類似政策的政治人物了（像是那些已開發國家的自由派的政策傾向）。所以翻譯這種概念的時候需要去更深一層地

研究各種的替代翻法和意義。

另外常出現的問題是名詞的性別。英文和西班牙文在這點上相當不同。當然我們知道女性運動的重要性，而且《全球對話》也刊登了許多女性主義的文章、性別議題的文章，各個國家都有。許多的批評指出西班牙文（以及其它語言）有性別偏見。所以有些作者，特別是那些處理相關議題的作者會審慎的用寫作策略去處理這個議題。但是我們翻的都是其他語言文化脈絡下使用英文寫作或翻譯出來的文章，若是作者在原本的語言下策略地去處理名詞的性別偏見的時候就無法彰顯出來。

不樣其他的編輯團隊，我們選擇把工作集中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的社會系中的一個小團隊。我們一旦收到英文版的文章，Pilar 和 Martín 就會依照主題和興趣去分配文章。翻譯者自己翻譯文章然後互相校對，然後 Juan 會全部徹底校對一次。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會得到 Lola Busuttil 的珍貴建議。她會多種語言，有豐富的翻譯經驗，對於西班牙版本相當有幫助。

加入這個《全球對話》的團隊學習到了許多，不論在翻譯能力上或是社會學議題的接觸上都是如此。《全球對話》讓我們更認識這個世界，豐富了我們的社會學想像。



Juan Ignacio Piovani 是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社會系的社會研究法教授，也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CONICET, 阿根廷) 的研究員。他在英國的倫敦大學獲得社會研究方法與統計的碩士學位，然後在義大利的 Sapienza 羅馬大學獲得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博士學位。他是阿根廷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rdoba 的博士後研究，也在巴西的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系擔任過博士後。多年來他研究社會科學方法的歷史、邏輯、基礎。從 2011 年開始他是阿根廷當代社會研究計畫 (PISAC) 的主持人，這是一個整合了 50 所社會科學院校的大型計畫。



Pilar Pi Puig 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攻讀社會學。她現在是社會科學系的博士生，研究環境社會學，興趣是都市脈絡下的環境、貧窮、不平等。她也在社會系工作，參與了許多研究計畫，包括了方法論議題於貧窮和不平等議題中的應用。Pilar 也參與 La Plata 市的貧窮社區的延伸計畫，和來自德國 University of Wuppertal 的學者共同合作。



Martín Urtasun 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攻讀社會學，是社會科學系博士生，得到 CONICET 的獎學金。Martín 研究當下的以科技媒介為基礎的「強制介入」安全政策，像是都市監視系統。他在理論上受到來自實用主義社會學和科技的社會研究的引導，使用民族誌方法。他也對於大眾教育感興趣，並且加入成人的 People's High School 成為老師和運動者，從事社會運動。

來信寄給

Juan Ignacio Piovani <juan.piovani@presi.unlp.edu.ar>

Pilar Pi Puig <pilarpipuig@gmail.com>

Martín Urtasun <martinurtasun@gmail.com>